

王跃文:有恒久价值的,必定与时俱新

在2013年推出爆款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之后,王跃文一直憋着一部“大作”。时隔八年余,他的新长篇《家山》面世了。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小说《家山》的故事发生在南方乡村“沙湾”,以陈姓为主的数百户村民世代在此生活劳作,老一辈中有年过七旬的乡贤佑德公、是村长也是道士的修根,年轻一辈里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齐美、留日归乡的扬卿、省城求学回来的齐峰等。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在世俗又充满诗性的乡村图景中,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婚丧嫁娶等冲突与争斗的命运变奏不时鸣响,一部波澜起伏的地方史诗徐徐展开。

《家山》原定名为“家谱”。大概十年前,王跃文重新翻阅族谱,读到了先辈兴修水利、倡办新学、拉起革命武装迎接解放的故事,特别是读到族人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组建自卫队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湘西纵队”,与国民党残余势力作斗争,为湖南和平解放立下功勋,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族上参加湘西纵队的人,按辈分都是王跃文的祖父辈、伯父辈。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人都是普通农民,口咬黄土背朝天,直到终老。当王跃文到了中年再回想起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都不在人世了。

《家山》主要写了陈家五代人,这些人个个精彩、事迹彰明,大多有现实原型。人称“乡约老翁”的刘桃香,原型是王跃文的奶奶,一个女人家独自上县公堂替村里打赢了官司。十三岁的童养媳来芳上门那天,低着头从八岁齐明的胯下进了屋,缘于“老辈人讲,阿娘(老婆)从你胯下进屋,一世都对你佩服帖帖。”这个场景原封不动地复制了生活。王跃文的母亲是童养媳,到王家门上那天,王跃文的父亲才八岁。

《家山》所写的年代,与王跃文的成长并无交集,他笔下的乡村故事,有自己亲眼目睹的,但大多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听来的。

王跃文1962年出生于湖南溆浦县,诗人屈原曾流放于此,生活达九年之久,留下“入溆浦余僵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之句。从小在乡村长大,书都读不到几本,他最初的文学养料不是名著,而是世代口头相传的民间故事。他的文学启蒙者不是老师,而是出口成章、能言善辩的奶奶,在听奶奶讲故事的时候养成了“形象思维”。

参加工作以后,最初是在政府机关写官样文章,后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始了业余创作。或许是文运畅达,一写就发表,一发表就有影响,他刚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就引起文学圈内关注。1999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产生强烈反响,受关注的程度超乎想象。

这部被称为开创了“反腐小说”先河的作品,因为逼真地描写了某种现实情状,成为当时最热销也最具争议的小说,仅盗版就不下10个版本,盗印数量不下500万册,甚至引来个体书商找“枪手”炮制冒名之作。

此后二十余年年间,王跃文笔耕不辍,创作多元。《梅次故事》《苍黄》《爱历元年》《朝夕之间》等现实题材佳作不断,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更是一纸风行,热销千万册,至今每到一地,都会有人抱着一大摞书让他签名。

或许是《国画》《大清相国》这样的作品影响太大,将王跃文其他题材的小说遮蔽了。虽然他曾凭描写原乡故土的中篇小说《漫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但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现实题材小说。

对此,王跃文十分理解——只因这



作家王跃文 受访者供图

类小说所写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人们因关注社会而关注我的所谓‘官场小说’,非作家所能奈何。”而无论是官场题材、历史题材,还是乡土题材,他关注的对象都是“人在特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性”。

说起创作《家山》的初衷,王跃文表示,并非想要通过这样一部小说改变读者对他的印象。而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回望故土,有了不能不写的冲动。

他自己也觉得不可解释的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十九岁上大学才离开乡村,乡村生活是最熟悉的,最有人骨入髓的体验,但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经验从未进入过他的创作视野,直到“四十岁以后,记忆中乡村的人与事朝我扑面而来”,他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认识到,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不但在于它所占地域面积巨大,人口数量巨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根脉在乡村。

从喧嚣的畅销书影响力中回归相对静默的八九年间,王跃文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钻研户籍田亩制度、捐税征收方式,等等,多次重返乡间田野做实地勘察,直到一方水土和那些村民已鲜明生动地鼓涌于胸口,他才投笔于纸上,娓娓道出那些鲜活的故事,写到动情处多少次泪湿衣襟。

在“沙湾”这样一个族群社会里,乡邻都知根知底,一家几代人是什么门风,村里人都有口碑。德高之人为大家所敬重,村人行事都会向他看齐。沙湾流行不少典故,“坐得黄包车,颠得屁股肿”是说人不要贪图和自身不匹配的事物,“拖檐底下定规矩,见不得人”是讽刺只顾个人利益的、不一碗水端平的人,这都是沙湾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而将族群凝聚在一起的则是“识好歹、知善恶”,是《家山》展现给我们的乡村伦理和乡风民俗。“曾经战争和政治的动荡同样摧残着乡村,但如果没有乡村传统文明的抵制和缓冲,战争和政治暴力的破坏也许更大。”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可以稿费为生的作家,王跃文每部作品起印都在几十万册。对于《家山》这样一部大量运用方言俚语且体量巨大的作品,王跃文坦言对销量没有期待。不过就目前情况看,《家山》的畅销势头不比他的过去任何一部小说差,小说刚出来就排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今年一月优秀畅销书排行榜文学类书籍榜首。盗版不是好现象,但盗版往往是畅销风向标。《家山》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书就出笼了。



扫码看视频

王跃文

1962年生于湖南溆浦。湖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画》《朝夕之间》《大清相国》《苍黄》等。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对话

在波澜不惊的讲述中达到静水深流的效果

读品:《家山》在人物称谓上很有地方特色,比如“阿娘”是老婆、“太太”是曾祖父,你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读者的接受吗?

王跃文:小说采用方言俚语,只是为了更真实、更准确地讲述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故事,采用格式化的普通话则会词不达意,或意味上不贴切。方言的艺术处理,最简单的有效办法是同一方言在不同语言环境中重复出现,读者自然就会心领神会,不会有阅读障碍。所谓方言俚语,其实就是古语在民间的遗存。溆浦人称妻子为“阿娘”,古人称妻子不是叫“娘子”吗?汉字中的实词都是表意文字,其意思大体上古今不变,只是读音会因时代或地域不同而有差异。汉字是汉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中华文明万古赓续、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字意义的恒定性。文学作品对方言俚语的艺术化处理,能够极大地丰富汉语表现力。

读品:县长李明达因为得罪了土豪劣绅而下台,国民政府推行减租减息失败。到解放战争后期,“各种地方附加比田赋多四倍多”。这个数据应该不是凭空写的。

王跃文:《家山》中关于税赋的描写都是真实的,我查阅了相关史料及研究专著,税捐种类和税捐负担都有历史依据。1949年前,民国政府县长更换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几个月就换县长的情况很常见。民国政府县长是省长和民政厅长两个人说了算,而民国乱世省长换得快,县长随之换得也快。《家山》里只换了六任县长,感觉已是走马灯了。民国政府包括税赋政策在内的很多国家管理措施问题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场层层腐败,基层绅士土劣化严重。

读品:小说中多次写到婚礼和葬礼,重复去写同样的事情是否也是一种挑战?

王跃文:《家山》中的婚礼和葬礼皆严格依据生活原生态描写,但又依据人物性格及小说情节需要进行文学化处理,读者也许能从这样的描写里体悟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多次写到婚礼和葬礼,但都没有重复的感觉。扬卿和瑞萍结婚,从年俗写到婚礼,整整用了三章的篇幅,把孝亲友悌,夫妻和谐,儿孙满堂,乡亲庆贺等等都放在婚礼里细细描写,展示一幅温馨诗意的乡村伦理风俗图。几场婚礼和葬礼描写各有侧重,有繁有简,但都不马虎潦草,必要体现中国人庄严的生命态度。

读品:《家山》所写的年代跟《白鹿原》差不多,但给人的阅读感受截然不同。《白鹿原》里,白鹿两家斗法,戏剧冲突不断;《家山》主要写陈家,总的来说,和谐安宁、生生不息,其中亲舅杀甥、火烧红属、齐树惨死,不可谓不惨烈,但都没有浓墨重彩去渲染。你希望呈现一个怎样的乡村?这样一个已成历史的乡村对于今天有何意义?

王跃文:《白鹿原》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我向陈忠实先生致敬。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有不同眼光,这是很正常的。马克思同雨果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他们对那个时代欧洲的认识,包括对法国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

我的小说从来不靠外在冲突吸引读者,而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

讲述中达到静水深流的效果。我写《家山》是依据自己对家乡变迁的了解来下笔的,并无预设的概念限定。乡村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变化很艰难,一方面是变中有进步,变中不变。新学校办起来了,旧式私塾先生李老师的学生扬卿很有些伤感。桃香自己小时候抗拒缠足,却逼迫女儿月桂缠足,这是社会进步中的悖论。《家山》描述的年代,社会动荡,血雨腥风,民生疾苦,但中国自古浸润民间的优秀传统时刻在疗救和弥合时代创伤,维系着基层社会脆弱的稳定和祥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小说中的佑德公、逸公老儿、修根一代是旧传统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而助夫、齐峰、扬卿、瑞萍、贞一则是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历史和时代都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演进。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又是明天的开始。《家山》里散发出的乡村传统文明之美是中华优秀文明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体现,这些都是有恒久价值的,必定会与时俱新。

读品:知识女青年贞一向县长呈文解除缠足陋习,结果这个事被县长朱显奇利用来作秀,决定开一个放足大会,当众给缠足妇女放足洗脚。废除缠足是进步的举措,但在一些妇女的体验里,却是侵犯性的而非解放的经历。我觉得你带有一种体恤的女性视角在写这段历史。

王跃文:我写禁止缠足的故事,也是展示进步之艰难。禁止缠足是解放妇女的革命措施,但此举在民间阻力极大,有时候最大的反对力量居然是受害者女性自己。当时,因为反抗放足而投河上吊的案件常有发生。民国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发布缠足禁令,但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偏远地区仍有缠足现象。县长朱显奇在放足大会上的作秀,看似有些漫画笔法,却是我依据真实史料虚构的。生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禁止缠足的故事,写了知识女性贞一的觉悟,也写了存在于民间的愚昧,还写了朱显奇这种官员的丑态,总之是写社会进步之不易。

读品:你的作品既有对现实的关怀,也有对历史的省思,还有对原乡的回望。在写不同类型的小说时,你想输出的观念有何不同?写作时的心境有着怎样的变化?

王跃文:文学阅读是全过程审美体验,没有哪个读者抱着接受教育的心态去读小说。人时时刻刻在教育与被教育的状态也是很可怕的,这会让人逆反,收到相反效果。我写任何题材的小说,都只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艺术地呈现我所理解的生活,塑造人物,讲好故事。读者读我的小说,或有大欢喜,或有大悲哀,或有大寂寞,都各由缘分,各由根器。

读品:上一部作品《大清相国》热销千万册,你认为现在的官员需要向古代的廉吏学习吗?

王跃文:《大清相国》自出版之日起一直畅销,至今仍是长销书。中国历史上很褒奖“良臣循吏”,他们也是百姓最爱戴的官员。时代进步了,陈腐的旧“清官意识”固然不必留恋,但清廉是为官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古代廉吏身上有很多优良品质值得今天的官员学习,只是仅仅学习古代廉吏还远远不够。新的时代,人民对公职人员有更高期待。